

■新作聚焦 格非长篇小说《月落荒寺》:

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

□宗城

《月落荒寺》并非格非的大部头,但在这部小说中,我们能看到格非近年来思考的母题。小说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婚后的庸常处境:妻子出轨,婚姻破裂,自己和儿子处在难解的尴尬中。主人公林宜生是卷入商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写照,他是苏州人,在南京学习10年,然后北上,成为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哲学教授。受益于市场经济和国学热,他在各地讲课,收入和地位跃升,名也有了,利也有了,可却仍感到虚无,尤其是在妻子与白人派崔克出国、儿子不服管教后,他走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,感受到无力和彷徨。

《月落荒寺》要写什么?我想,一篇关于格非的采访提供了线索。在《上海书评》刊发的《格非谈〈江南〉内外》中,格非说:“实际上我当年部分采访了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里讨论的‘常人’——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‘无此人’。很多人活着,但并不存在。存在是我们的最低目标,也是最高目标。用米沃什的话说,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‘我在此’。为什么是我?为什么我在此,而不在彼?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存在,感受自己的有效性,确认自己生命的意义,而不仅是像符号一样的活着。”

格非在多部小说里以知识分子为主角,但他们不再是兼济天下、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参与者,而是一个个边缘人,在急促的社会转型期无所适从。《春尽江南》里,诗人谭端午沦为无所事事的废人。《月落荒寺》中,宜生名利兼收,仍解决不了生命的空无。这些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角,也无法通过劳动介入社会变革,他们要么迎合潮流,成为商业和政治的附庸,要么主动边缘化,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

在格非的小说世界里,尤其是时间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小说,知识分子要处理的不再是天下问题,而是地位落差后的矛盾。从《月落荒寺》联想到格非这20年的创作,他都在处理知识分子和商业社会的关系。格非意识到乡村的消亡不可避免,所以他写作《望春风》,弹奏一曲乡土的挽歌。同时,他看到知识分子在以都市为主的商业社会的无所适从,他写《春尽江南》,写《月落荒寺》,乃至更早的《欲望的旗帜》,都在探讨当知识分子不再崇高,甚至沦为“末人”,他们如何自处,又如何调节自己和世界的关系。格非并非仅为知识分子辩护和感伤,他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,与其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边缘化,不如说他们离开了本就虚高的位置,20世纪为知识分子制造了幻梦,很快又捏碎,循环往复,直到心如死灰。

当格非回溯历史,他发现当今知识分子的困惑,早在历史上就多次浮现,比如他屡屡提及的《金瓶梅》和中期后社会,那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出现,士人集体困惑、堕落的时代。在格非看来,《金瓶梅》的问题既是明代的,也是现代的,他写了那么多小说,都在回应《金瓶梅》,因为那是他最喜爱的小说之一,他曾公开表示,自己对《金瓶梅》的推崇更甚于《红楼梦》。

但是,格非在完成“江南三部曲”后,他的创作也出现了某种瓶颈。一个是题材和人物关系的自我重复,一个是叙述语言的知识分子腔。格非写得最传神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和充满欲望的女性,但在



格非写知识分子,更关心他们世俗的一面,精神的崇高被解构,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欲望。当现实压垮理想,人被琐碎缠绕,主人公们产生厌世情绪,而稍微能救济他们的,是书本和女人,但对这两者的依赖,也在无形中消磨他们。

描绘其他人物时,就显得概念、空泛。《月落荒寺》里的楚云,在人物塑造上并不如宜生饱满,她更像一个知识分子想象的女性,投射梦幻和欲望的符号。自始至终,楚云更像知识分子的一个梦、一个情人,她不涉及柴米油盐,没有自己的脾气,她的出现和消失都是功能性的,为小说的情节服务。

《月落荒寺》中的女性大多是被动的、功能性的,缺乏自己内在的张力。比如第32节,楚云去接待一个来自美国的教育团,想起她当年在芝加哥,一个老外和她搭讪,随手搂住她的肩膀,小说写道:“刚到美国的楚云,觉得拒绝人家有点不太礼貌,就怯生生地答应了。那个人将她直接带回了自己的公寓。楚云糊里糊涂地跟他上了床。”楚云在这里完全是被动的,她为什么跟那人回家,为什么上床,她的心态变化是怎样的,在小说中没有交代。仿佛她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交了出去。在完事后,楚云虽感到一点屈辱,但小说对此仅是一笔带过,旋即转入楚云和那人温和的对话。

同样,宜生妻子和加拿大男人之间,妻子也是一个被欲望牵引、模糊不清的符号,妻子具体的心境,在小说中也被隐而不表,我们能看到的,是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叙述,而女性只是充当配角、符号和欲望的化身。

格非写知识分子,更关心他们世俗的一面,精神的崇高被解构,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欲望。当现实压垮理想,人被琐碎缠绕,主人公们产生厌世情绪,而稍微能救济他们的是书本和女人,但对这两者的依赖,也在无形中消磨他们。

在格非的小说中,知识和女性是两大叙事动力,也是欲望横生和毁灭的表层原因,女人成为格非小说中典型的喻体,女人越蓬勃,越反衬男性知识分子的空无,女人的介入和离开,成为知识分子在失势以后,对过往的追忆和对现世的嗟叹的触发机关。千禧年后,格非虽然退出了先锋姿态,用更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作,但他的思考仍是先锋的,延

续着他在《欲望的旗帜》里的表达:知识分子被三重落差压得喘不过气——理想和现实、过去和现在、欲望和萎靡。

固然,格非对知识分子书写存在反思,早在《隐身衣》和“江南三部曲”里,他就不乏对知识分子自恋的讽刺,对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建构的历史保持怀疑,比如《隐身衣》中,一个做胆机的生意人对教授不吐不快:“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,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,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,你会发现,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。不是吗?”这段话,其实就是格非借人物说话,言说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。

在阅读格非的小说时,我想到艾略特的长诗《荒原》。在《荒原》中,艾略特借鱼王的遭遇描写了现代人精神的衰弱,当“上帝死了”,西方人面对的是一个道德沦丧、性爱泛滥,可人们又无法找到更高追求的荒凉境况。无独有偶,在那个迷惘的年代,乔伊斯、卡夫卡、伍尔夫等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涉足了现代人这种“荒原”处境,它是在崇高精神被瓦解后,知识分子面对琐碎和物质过剩的年代的无所适从。

百年之后,当艾略特已离开人世,知识人的荒原处境却并非消解,反而在第三世界里如幽灵般回荡。中国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大潮后经历的,实则是欧美诸国在20世纪城市化、商品化进程中的回音,但所不同的是,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是因为商品浪潮的冲刷,它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,互联网年代技术革命,还有整个社会对实用主义、消费主义的信奉,都削弱了知识分子的地位。随之,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其他角度接纳自己,在一个全新的浪潮中,寻找自己的合适坐标。所以,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,而格非的小说,若是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考量,就是对这个转型时期“知识分子的荒原”现象的心灵写照。

■关 注

初拿到《敢为天下先》时,我以为李鸣生是给自己出了道难题。题材不似他先前写过的航天文学那么突出,题目也没那么新颖,写了那么多航天题材,关于航展,大概是不容易写好的。但是看着看着,我被感动了,甚至落泪了,李鸣生写活了20年来为办好每一届航展辛苦付出的航展人,写出了他们的艰辛,他们难以言说的不易,他们从无到有、扭亏为盈的艰难,写出了从捉襟见肘到游刃有余的从容,也成功地反映出珠海人敢为天下先的实干精神,整部作品元气充沛,浑然天成。

李鸣生和航天有缘。他自参军就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,出版了“航天七部曲”,还写过大量有关航天的诗歌、小说和影视作品,是当之无愧的航天文学奠基人、开拓者。《敢为天下先》不但体现出他固有的才华、眼光、胆识、魄力和创新精神,更突出了他一贯追求的真实。

报告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,最能体现真实的是细节。书中鲜活生动的细节不止体现了真实,还揭示了真相。首先,《敢为天下先》真实地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、丰满鲜活的航展人。比如市长梁广大的特立独行、神通广大,正是他的超前眼光和决策,决定了航展在珠海落地生根的命运。但是作家也毫不讳言,由于梁广大对于环境的挚爱和捍卫,造成了大桥栏杆的美观有余坚固不足,以至于两车相撞时差点掉进海里。“改,马上改!”4个字,梁广大知错就改的党员干部形象就树立起来了。

副市长周本辉是个血性汉子,“血性”体现在他的敢于担当,在所有人争论不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,他挺身而出,大声说:“我就是最高苏维埃,这事我做主,就这么定了,出了问题我负责!”这话在当时的处境下说出,不亚于战场上的豪言壮语。还有睿智温和的周乐伟、男儿有泪也轻弹的周作德、护航女神苏全丽……书中生动真实地写出了他们面对航展实实在在、无边无际、无可奈何的累,正是这种累,反衬出航展人面对困难敢为天下先的魄力。

其次,李鸣生在写作中真实地面对矛盾,不回避问题。前两届航展成功的同时暴露出包括体制、经营方式、现场管理、专业能力、对外服务等方面的问题。2012年国庆节前一天,在距离航展开幕不足一个半月的关键时期,有关领导提出距离党的十八大开幕日期太近,商量调整珠海航展举办日期的方案。结果,使用排除法得出的答案让大家十分震惊:没有任何国家部委提出要求停止飞行表演和公众日。作家在这里提出了“令人遗憾的‘中国式思维’”。这种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,航展人没有回避,作家也没有回避。也正是这种不断的反思、警醒和调整,使珠海航展公司逐渐摆脱了内忧外患、四面楚歌的困境,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,也使得作品的真实性、思想性的融合更显厚重。

第三是说真话。作品中既有科学、严谨、专业的知识呈现,也有活泼生动的语言调剂有可能沉闷的叙述。李鸣生崇尚巴金老人“说真话”三个字,他说过,一个作家敢不敢讲真话,是态度问题;讲得好不好,是水平问题;明知是假却要说真,或者明知是真却要说假,则是人品问题。尤其是报告文学作家,挖掘真相,暴露谎言,更是责无旁贷。另一方面,李鸣生在展现人物形象时也不失风趣,在描写俄罗斯勇士的飞行表演时,作家借用了网友的评价:“需要做的并不是拿着相机拍照,而是扶好你的下巴以免掉下来。”

李鸣生的真实,首先来自作家的独立。在几十年的航天文学创作中,李鸣生几乎是孤军奋战。没有任何部门单位给他资金的支持,他完全凭一个作家的良知与责任,凭着生命的自觉去写中国航天的历史,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。其次还有胆识和勇气。有人说,作家的胆识比才艺还重要。对于20年间12届航展的整体描述,李鸣生既有对航展人的具体描写,有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揭示,也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省。最后,还来自真实的采访和写作态度。现实题材比较难写,因为需要巨大的采访劳动。但是李鸣生把这些难度巧妙地化解了,多年的创作早就练就了他对于大题材的驾驭。珠海航展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、外交等多个方面,关乎民族精神、民族命运等重大问题。《敢为天下先》的写作就是置于世界文化的格局下,置于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轴,置于天地人的空间上,真实完整地呈现出航展人对航展的用情用心之良苦,真实地挖掘热闹背后的孤苦,也真实地反映出珠海乃至国家的大发展、大变革,而这真实性又和艺术性有效地高度融合。

一个优秀作家总是要找到写作的社会切口,从而完成对生命的表达,李鸣生的“切口”就是中国航天。《敢为天下先》描写了中国20年航展的宏阔历史,李鸣生在这部25万字的作品中浓缩了自己对中国当下社会的思考。几十年间,李鸣生始终秉持着文学本心和作家良知写作,将整个生命融入了报告文学创作,他的创作轨迹一直延伸在当代社会前沿,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创作态度,这也决定了《敢为天下先》是一部优秀的与我们所处的时代血脉相连的作品。

■新作快评 刘笑伟、王志国长篇报告文学《万里瞻天红旗扬》,《中国作家》纪实版2019年第11期

为报告文学写作注入文体新意

□佟鑫

刘笑伟、王志国的长篇报告文学《万里瞻天红旗扬》是一部气势恢弘、结构复杂、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优秀作品。

作品聚焦32年坚守开山岛的王继才,一个人、一个岛,他的生活是单调枯燥乏味的,如何从这样的生活里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素材,对于写作者来说是一个考验。写作者从人的生存外壳由表及里地观察分析,深入到生活场景的背后,关注人物现实处境,抓住生活本身之中的矛盾冲突,将素材的选取与结构一起考虑,围绕“家国情怀”设计了“岛一家一国”这样一个结构。这既是一个平衡的结构,也是层层递进的结构。于是,王继才为什么守岛、为守岛付出了怎样的奉献、王继才精神与时代的关系如何,也一层层体现出来。在近半年的时间里,写作者采访了王继才的家庭成员和朋友,通过大量的细致的实地采访、考察,建立起庞大的信息库,进而通过一个交叉有效的多层次结构,为所有素材创造了足够的安放空间和合适的位置,为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的纪实性基础。

在确保故事真实、可信、逻辑严密的基础上,写作者并不满足于将王继才的事迹简单展示给读者,而是在作品的文学性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功夫,将文学触角伸入到王继才及其家人的内心灵魂深处,进行人性的剖析与探微,让读者从写作者朴实的描写中

看到了人性中软弱、挣扎和犹豫的一面,同时也看到了超我终于战胜自我的光辉一面。

在作品中,王继才有过两次请辞,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成功。第二次是1996年,距离王继才上岛已经过去了10年,但是面对癌症晚期的王政委的嘱托,王继才请辞的话到了嘴边,却始终没有说出口。正是这种正常人的矛盾与纠结,才使得王继才这个人真实可信。正如硬币一定有正反两面,事物也注定具有两面性,《万里瞻天红旗扬》对王继才这个人物的塑造是立体的、成功的,主人公的心灵史和成长史是真实的、感人的。

如果说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根系的话,那么,艺术性就是非虚构文体的品格内涵。由于写作者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同时,还从事散文、诗歌等文学形式的创作,所以散文的笔法和诗意的要素就自然而然地运用到了作品中来。从而使新闻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多种文体要素在《万里瞻天红旗扬》里得到了有机结合,使文本同时兼有小说的悬念、新闻的简洁、散文的抒情、诗歌的灵动。特别是小说手法的运用,大量使用生动的情节和细节,巧妙营造戏剧性的冲突场面,成为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亮点。作品中,环境气氛的营造制造出了悬念和紧迫感,人物置身其中,内心的慌乱、急切、痛苦在一系列不停顿的动作中展现出来,使读者

深切感受到人物平凡命运中的悲壮和坚韧。

这部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突出的影像化。作者借鉴电影与纪录片的表达技巧,用立体的思维与角度观察人物,梳理、整合那些个体的经验,使作品富有画面感。刘笑伟说最开始接受任务时,王继才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是模糊的。经过半年的采访后,王继才的形象才逐渐在他的脑子里清晰起来。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、家庭红色文化的熏陶和自己的英雄情结共同塑造了王继才。写作时,他感觉自己就是在看着王继才在小岛上演绎着那些爱国奉献的故事,就犹如在头脑里“演着一场电影”。于是,作者将一幅幅精心剪裁过的画面如镜头语言般呈现在读者面前,生动的画面感使人产生直观的视觉感受,形象化、视觉化的文本内容通俗易懂且生动引人,使人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,如同观看了一场电影。

小说、电影、散文等跨文体语言的交叉、交替运用,使这篇报告文学具有了文体样式的新的意。丰富的艺术手法作用在人物内心世界上,将人的命运和追求、人物灵魂深处最可贵的精神力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无论从文本和内涵上,《万里瞻天红旗扬》都堪称一个报告文学的优秀样本。我们期待着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有更加广阔的视野,在艺术上有更多的探索,涌现出更多不辜负时代的优秀作品。

■短评 寻佛山文脉 彰士大夫精神

——评李自国《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》 □樊星

广东佛山,人杰地灵,闻名遐迩。从唐宋年间经济、文化的繁荣到明清之时,曾与河南朱仙镇、湖北汉口镇、江西景德镇一起号称“四大名镇”,至今一直发展迅速,富甲一方。这些年,佛山人也在从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到“文化导向型城市”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。其中一项可观的工程便是有关部门组织专家、学者编辑出版《佛山市人文和社科研究丛书》。其中,由李自国编著的《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》一书为人们了解佛山的历史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。

这是一部潜心5年的用心之作,李自国通过对史书上佛山文苑人物传记钩沉、考订、整理、辑注,深入梳理了佛山的文脉,彰显了佛山的文心。在从晋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时段里,佛山代有人才出,无论显达还是清贫,也不管处于盛世还是乱世,都能自强不息、有所作为,在历史上留下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足迹。他们的事迹和作品散布在各种史书、方志中,如今辑成一册,成为乡贤文化的宝典,足以烘托出佛山文化的精神。说到佛山所属的岭南文化,一般都会论及多元、务实、开放、兼容、创新等精神元素。然而,岭南文化也养育出了林则徐、孙中山、康有为、梁启超这样的历史人物,彰显了岭南的刚健之气、威武之魂。

《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》中钩沉的历史片段读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如关于韩愈贬谪潮州时,李文儒因为“州小俸薄,宜加优礼……愈逊谢不受”的记载,就写出了历史上并不少见的一幕:名臣被贬流放,其名依然响亮,赢得流放地官民的尊崇,传为佳话。还有梁储敢秉公直言,同时也善于斗争,搬出太祖遗命,迫使昏君由怒转畏,放弃一意孤行的昏庸旨意一节,也令人想起史书上士大夫无所畏惧、与独裁霸道斗争的一幕幕悲剧,而且斗争的结

果有时居然也属于有骨气也有政治智慧的士大夫,就很能够耐人寻味。还有康有为在剧烈的政治变局中尽力拼搏,到头来“怀今感旧,伤痛已甚,哭笑无端”,亦是多少士大夫壮志未酬的生动写照。读着读着,就身不由己被那些文献带入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中,感悟到士大夫与文学、政治、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。他们知书达理,深明大义,却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场险恶的风浪中,令人喟叹也使人崇敬。

由此可见,《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》在辑录了佛山士大夫往事的同时,也足以启发读者对于历史以及士大夫传统的哲理思考。一说到士大夫传统,就很容易想到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,想到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甚至不乏“愚忠”“奴性”的“劣根性”批判等等。然而另一方面,士大夫中也有不少刚毅正直、忧国忧民之士,即是遭贬,也痴心不改的英雄好汉。这样的士大夫从屈原、王安石、海瑞、于谦、林则徐……一直不绝。他们读圣贤书而明大义,遇奸佞敢于抗争,被贬谪凛然不屈,虽饮恨而青史留名。谁说这样的士大夫精神与现代的知识分子品格相去甚远?作为一种文化精神,其实二者悠然相通。

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。在各地纷纷开发本土文化资源的当下,在各种风味美食、节庆风俗、名山名寺、文化旅游纷争奇斗艳的当下,寻士大夫文化之根的文化工程显得独具光彩。他们的行踪、事迹,他们的各种著述,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,值得认真研究、发扬光大。多年来,各地的城市文化建设中,对于文化名人的宣传一直成效显著,令人欣慰。如何进一步做好乡邦文献的深入发掘、系统整理、广为传播,这本《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》做出了可贵的努力,值得一读。

——评李鸣生报告文学《敢为天下先》 □舒晋瑜

中国航展二十年的背景